

跨文化研究译丛

周宁主编

Martin W. Lewis, Kären E. Wigen

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跨文化研究译丛

周宁主编

Martin W. Lewis, Kären E. Wigen

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美] 马丁·W.刘易士 卡伦·E.魏根 著

杨瑾 林航 周云龙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陆的神话: 元地理学批判 / (美) 刘易士
(Lewis, M. W.), (美) 魏根 (Wigen, K. E.) 著; 杨瑾,
林航, 周云龙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跨文化研究译丛 / 周宁主编)
书名原文: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ISBN 978 - 7 - 208 - 09780 - 3

I. ①大… II. ①刘… ②魏… ③杨… ④林… ⑤周
… III. ①文化地理学—研究 IV. ①G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6364 号

策划编辑 曹洪燕
责任编辑 曹洪燕 袁晓琳
装帧设计 王小阳



世纪文景

大陆的神话: 元地理学批判

[美] 马丁·W. 刘易士 卡伦·E. 魏根 著
周宁 主编 杨瑾 林航 周云龙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8
插页 2
字数 327,000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780 - 3 / G · 1413
定价 59.00 元

总 序

周 宁

西方现代性留给我们的思想陷阱，不在观念本身，而在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真正的问题是，如果你将启蒙哲学与西方现代扩张历史对读，就会发现知识与权力危险的合谋。跨文化研究解构现代性宏大叙事，诸如理性、自由、民主、文明、进步之类具有普世道德主义意义的宏大观念，实际上都是西方现代扩张的意识形态，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事业服务。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自由是西方权力的工具；进步之所以有益，是因为进步可以支持扩张。跨文化研究视野下的批判理论解构宏大叙事，为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提供了辩证的否定面，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西方现代性的缺陷，又可以发现其活力。

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想像的基础的同时，也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自由主义史学构建的宏大叙事，认为自由不仅不是西方的历史事实或历史理想，甚至可能是历史骗局。戴维·格雷斯的观点并未如此极端，《从柏拉图到北约：西方的敌与我》开篇所谓“自由之所以生长和发展，乃是因为它对权力有益”，并不意味着全书的主旨。他不过是想用新、旧西方的历史检验历史哲学，证明自由在西方历史中的复杂意义。西方并不是惟一的，对世界不惟一，对自身也不惟一。旧西方是古典文化、基督教和日耳曼因素的综合体，理

性、民主、资本主义的新西方，更是一系列突变的累加成果。西方以自由为核心的标准历史叙事是片面不完整的，自由作为一种历史中的实践和制度，并不等同于西方身份，自由成为西方特定的“本质”，是特定历史话语的产物。西方就是西方，不是世界本身，更不是世界的未来。

跨文化研究提供一种超越的视点解构西方现代性，从逻辑前提与价值根基上颠覆现代知识体系，全面而彻底。现代性思想试图在一种理想的时空框架中为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建立一种“观念秩序”：世界的空间分为东方与西方，是二元对立的，时间从过去穿过现在通往未来，呈三段式进步。西方现代性为世界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观念秩序，进而塑造世界的现实秩序。这种观念秩序以线性历史观和元地理学为基础，为现代知识规定了明确的时空框架。地理学者马丁·刘易士和历史学者卡伦魏根合著的《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分析“隐秘的权力地理学”，从元地理学批判开始，挑战了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地理知识体系。元地理学是一种无意识的空间结构，通过它人们不仅构建起关于世界的知识，引导着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科学甚或博物学等学科的研究，而且发挥着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权力。西方现代思想将地球随意分成大洲，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都不是简单的地理学概念，而是文化与地缘政治利益的隐喻，“元地理学神话”在源头上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痕迹。

帝国主义权力缔造的专横世界观念，业已成为当今世界公共知识架构的基础，这是跨文化研究面临的所谓现代性精神结构的困境。你无法在公共知识架构之外讨论问题，除非你不以知识的方式讨论问题。跨文化研究试图超越西方现代性的精神困境，克拉克的问题是，如果萨义德从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理论出发揭示东方主义令人生畏的权力结构，“反写”了西方文化霸权体系，那么，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希望面是什么，东方主义话语是否潜在着开放性以及东西方文

化是否有互动互惠的可能性？《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关注东西方之间跨文化交流的建设性问题，历史上东方思想曾经在科学、伦理、宗教、神秘主义和哲学等领域里，激起过西方深刻的反思，构成西方文化矫正启蒙理性的“他者”智慧。海德格尔说现代是一个“世界图像”的时代，这个图像的时间维度是古代、现代与未来，空间维度是西方与东方。西方现代性在这种“世界图像”中获得自我确证的整体性想像。克拉克具有肯定东方思想的诚意，但依旧在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元地理学”神话中讨论问题。

西方现代性从观念上规训世界的方式耐人寻味。在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历史与世界体系中，不了解西方就不了解世界，同样也不能了解中国。艾兹赫德的著作《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将中国历史当做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分析中国同西欧、非洲、美洲三大文明的关系，以及中国在西方规划和建构的新兴世界秩序的地位，尽管强调中国历史对生态、政治、文化和技术等新兴世界体系诸多方面的贡献，但分析框架依旧是比较现代化研究，离不开西方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世界历史进程表现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在此进程中西方现代性实现其“世界命运”。作者分析“世界历史中中国的意义”，眼界是世界的，视角与价值仍是西方的。解构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关键在于揭示西方现代性话语中隐藏的“令人生畏的结构”，其危险与诱惑已经深入我们的文化无意识。不仅西方学者无法摆脱，中国学者也难以逃避，因为你无法不在现代性知识框架内讨论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只是画在墙上的门，并没有提供出路。

跨文化研究并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关注他者智慧的思想方法。他者的意义不在印证自我的那一面，而在自我无法理解的那一面。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西方现代性知识体系，既是摧毁性的，也是建设性的。摧毁性表现在其普遍怀疑主义的解构性批判上，建设性则表现在西方文化自身包容对立面的辩证的开放性上。跨文化

研究在西方文化传统内批判西方现代性，构成西方主流思想的对立面，恰好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方式，加强了西方文化传统的活力。西方现代性文化包容对立面，表现在知识与制度不同层面上，为批判精神、为民主制度。理解这一点，才能够懂得后现代学术在西方思想语境中的积极意义，它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完成自我肯定的意义。同一种思想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意义是不同的。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进入中国，中国学者关注其摧毁性，忽略其建设性，以为后现代思想颠覆了西方现代性与启蒙传统，西方的没落已经没落在思想传统上，误解不是不明白理论，而是不明白不同文化语境中理论的意义。

跨文化研究关注理论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不同的意义。西方后现代思想进入中国语境，可能为前现代的中国立场与方法辩护。不了解中国，也不能了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中国意义。西方文化语境中，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意味着西方文化自身的开放与包容性以及自我反思与批判的活力；而在中国，却可能转化为自我封闭自我肯定的前现代文化偏见，为褊狭的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的民族主义所利用。我们惯于在中西方或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下思考问题，凡是西方对的，我们就错；凡是西方错的，我们就对。即使是否定西方的思想，思想方式也是西方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属于典型的后殖民主义文化遗产。西方后现代理论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在潜意识中成为中国前现代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证明，这种观念愚昧而危险。一则西方后现代的思想解构不仅不意味着西方的衰落，反而表现出西方文化特有的生机，二则即便是西方现代性存在问题，也不能说明中国传统就是完美的。

跨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与中国方法，在于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回应中国文化自觉与文明崛起的时代问题。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思考现代中国文化自觉的问题，重要的不是高谈多元共处、多极均衡、和谐发展的理想，而是认清现实，积极面对文化多元

主义背后的西方现代文化一元主义的强势冲击，焕发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力；不是一味到古代中国思想中寻找复兴的资源与灵感，从后殖民文化的西方中心主义滑到大国崛起梦幻的东方中心主义，而是冷静深入地思考，寻找一个跨文化的、超越的、普世的立场。孟德斯鸠先生曾这样自我检讨：“如果我知道一样东西对我有好处，但对我的家庭有害处，我会把它从心中驱逐出去。如果我知道一样东西对我的家庭有好处，但对我的国家不利，我会试着去忘掉它。如果我知道一样东西对我的国家有好处，但对欧洲有害处，或者说对欧洲有好处但对整个人类不利，我会将它视为罪恶。”

译者序

《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是一本难以被简单归类的书。本书的两位作者刘易斯和魏根分别是杜克大学地理系与历史系的教授，他们对源于欧洲传统的元地理学结构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梳理与解析，尤其是在东西方的空间、文化的历史建构过程的还原方面，用力尤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元地理学的质疑与批判。然而，他们的关切与抱负显然并不仅仅停留于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地理学层面，而是由此推进，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根源和观念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与反思。

正如标题所示，元地理学是本书的一个核心概念。作者把元地理学界定为一整套空间结构，通过它，人们构建起关于世界的知识。事实上，人们对于涉及自身的每一种认识与关切，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等，都调动了相应的元地理学知识。例如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三个世界”的划分，正是元地理学观念的一种延伸。最简单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元地理学观念就是把世界作出“西方”与“非西方”的划分。在这个传统上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把世界依照与欧洲的距离远近（包括地理距离与文化距离）划分为若干重要程度各不相同的地理范畴的观念体系。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元地理学观念在世界史著作的编撰上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长期以来，西方人编撰的世界史著作往往习惯于把世界缩小到欧洲的地域范围之内，亚洲被轻易地

以最短小的篇幅处理掉，中东和北非却常被单抽出来，给予多一点的重视，原因就在于它们与欧洲的关系更近些。作者进一步揭示了传统元地理学观念所产生的四种神话：大陆的神话、民族—国家的神话、东方与西方的神话以及地理一致性的神话。这四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充满自身矛盾、明显狭隘的元地理学概念长期以来不仅没有得到充分的批判和纠偏，反而成为支配性的思维模式，影响着绝大多数人的地理空间想像。因此，本书作者的根本意图就在于追溯这一整套看似便利实则无效的地理神话是怎样从元地理学观念中发展出来，并把我们的带入当下混乱的地理学处境之中的。

在回顾欧洲中心主义的地理学观念的过程中，作者出色地清理和反思了众多西方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地理学观念，从启蒙运动思想家对东方的漠视到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定义，同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立场与观点。比如，针对卡尔·魏特夫大名鼎鼎的“治水导致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作者揭示了魏特夫“环境决定论”的错误逻辑，指出魏特夫并不是根据社会地理的具体事实，而是从冷战的立场来设计他的理论的。日本和印度同样存在水利灌溉与治理的问题，却并没有发展出“东方专制主义”。依照当代区域研究专家的发现，即便是被魏特夫认为是水利专制统治核心的中国北方平原，也只有小部分耕地曾被灌溉过。这些被灌溉过的土地通常是通过当地的小井来灌溉的。此类精当公允的分析在本书中比比皆是。

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元地理学观念进行批判反思的同时，并没有简单地走向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而是与非洲中心主义（作为反抗理想而生的激进观点）、文化左派或后现代主义保持了某种清醒的距离。作者认为一个诚实的元地理学批判方案应该避免成为“倒置的欧洲中心论”，而必须挑战各种形式的错误推理，发展出一种新的框架来。这就是经过改进的世界区域方案。在本书的第六章，作者详细阐述了选择世界区域结构作为一种新的元地理

学框架的理由。

作者在开篇描述了美国当代教育体系中地理学科教育的匮乏与陈旧。这导致大多数美国大学毕业生对于世界的概念极为模糊，即便在声望甚高的大学，也会发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四年级学生面对世界地理略图，会无意地把亚洲定位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相对而言，当代中国人无疑更具有世界眼光，这根源于百年以来中国人所遭遇的历史命运。一个古老的国家毅然抛弃“中央大国”的元地理学观念，重新“睁眼看世界”，去认识现实之中复杂的世界格局。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无疑具有极端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翻译的具体分工如下：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杨瑾博士翻译了导言、一至三章及相关部分的注释，林航博士翻译了四至六章、结论及相关部分的注释，并编制了全书的译名对照表。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周云龙博士对全书译稿进行了仔细的校译工作，提高了译稿的整体质量。本书涉及的学科门类众多，不少专业术语与特定表达的翻译还有待商榷，恳请专家读者指正。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决心把澳大利亚增添在亚洲地图上。事情是这样的,他7月末抵达文莱,在一年一度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并提出重新绘制地图,要把澳洲大陆直接纳入东亚半球的中心。

然而,这位雄辩的外交官没能让所有的人都认可他的区域划分设想。针对这一问题,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巴达维(Datuk Abdullah Ahmad Badawi)在回答澳大利亚新闻记者时说:“如果瞅一眼地图,我就会不假思索地说澳大利亚不是亚洲的一部分。”“你们并不了解自己的地理构成。”

——默里·希尔伯特(Murray Hiebert)^[1]

不论我们承认与否,人类对自身事务的每一种全球性关照都调动了元地理学(metageography)的相关知识。元地理学意味着一整套空间结构,通过它,人们构建起关于世界的知识。这些习以为常的无意识框架操控着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是博物学的研究。^[2]这本书的写作秉持着一种信念:对这些框架进行一次迟来的但彻底的检讨。

随着冷战的结束,普遍的全球地理观念在英文世界已变得空洞无物且摇摆不定,既有的方法尺度也不再胜任新的空间现象的组织划分。在冷战的对抗状态中,美国人倚重三足鼎立之势来描绘地图;^[3]然而,如

x

今共产主义的第二世界几乎崩溃,令人宽慰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区分也正在被不同的经济增长比率所撼动。对于划分地球的大陆组成观念的怀疑变得更加微妙,它曾使几个世纪以来有教养的欧洲人把地球的基本地理结构想像为理所当然;如今我们虽然仍采纳这种大陆划分的观念,但对于这些大陆何在、何解的疑惑却与日俱增。世界区域(region)或地区(area)的概念也令人困惑。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者们习惯于根据地域研究的观念来构思他们的全球研究;现在,当基金会威胁着焦点地区(area-focused)的研究,撤销对其支持时,学者们发觉,世界区域的重要性遭到了质疑。甚至像获得了基本的、表面上是永久的地域实体地位的民族国家,也突然显得脆弱不堪;1989年以来,地图绘制者们不得不对世界基本政治地图进行多次修订。不过,最成问题的或许是我们尤为简易、极为秩序化的地理观念,那种把世界作出所谓的“西方”与非西方的划分。这一术语持续得到使用,即便在它的批评者那里也是如此。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以这种方式划分全球的概念是偏执与歪曲的,并已遭到猛烈谴责。

不过,概念化带来的危机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不同的集团都在建议划分世界的新思路,竞相为21世纪提出比较合适的地理学范畴。尽管如此,何去何从却依然晦暗不明、众说纷纭。许多作者用两极方案(bipolar scheme)来取代第一、第二与第三世界的划分范例,以富裕的北方来对应贫穷的南方。然而,这些术语的使用既不精确也不稳定;正如1991年的那次学术会议,它关注地缘政治学而非社会发展,这次会议使用北方(North)这一范畴——不加任何注解地——来指代前苏联(the former Soviet Union)和它曾经的同盟者。^[4]另外一种划分世界的方式是:核心(core)、半边陲(semiperiphery)和边陲(periphery)。这一类术语最明显地被应用于世界体系理论家与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他们认为构造现代世界的基本材料是些连锁的政治经济区域。^[5]相反,以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一群政治理论家则宣称,新兴世界秩序中的关联体

(relevant units)表现为少数古老的文明形态,据称每一关联体都有意地一再声明它们的同一性,甚至有可能投入与邻人的战备状态中。〔6〕

正如上述的最后一个案例提示的,就新的提议出现的时候,旧的地理架构也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回旋余地。流传甚广的非洲中心论便是饶有趣味的一例,它实际上意味着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生活基本上是沿着大陆线组织起来的。这一论点更为极端的表述是,构成非洲的不仅是互相接壤着的陆地,而且是融合为一体的人类社群,绝对与众不同,完全位居于人类的经验的中心地位。莱纳·切尼引导的“西方文明”的铁杆支持者们,通常采用近似的大陆框架,尽管他们都必然地要根据地球的不同地形地貌区来确证其中心。〔7〕这一阵营中的乐观派们,宣称共产主义的衰落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指出21世纪全世界都会看到西方自由主义与民主的特定优势。〔8〕另一些人持有比较悲观的看法,认为自由主义与民主纵使不走向灭亡也将处境维艰。本雅明·巴伯构想了一个未来,一个由反民主的、道德败坏的全球资本主义系统联结而成的“大世界”(McWorld)。但是,这个“大世界”同时也为蔓延开来的种族主义“圣战”(jihad)所借用。〔9〕在一篇载于《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的富有影响的文章中,罗伯特·卡普兰同样断言一个“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支配世界的,不是稳固的资本主义中心或者古代文明,而是毒品集团、黑手党、私家安全局组成的“影子似的触角”(shadowy tentacles)。接着,卡普兰提倡一种新的绘图法,能够作为“无秩序的持续转化着的表现”。〔10〕然而,另外一些思想家仍然相信,无处不在的混乱完全否决了绘图的意义可能性。乘着后现代主义者的旋风,学术上的进展表明“游牧文化”(nomad culture)的兴起和模糊边界的跨越,这些无不暗示了元地理学的特质已经变化莫测。〔11〕

在差异的背后,所有的这些方法都拥有一个特性:对于已有的元地理学结构抱有很深的怀疑主义。〔12〕怀疑主义是值得肯定的,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左右我们的人类社会基本的空间图景显然是有缺陷的,在人

类探究的每一个领域、每一项研究中都附着令人困惑的结论。其次,不考虑空间表述上的绝对精确,元地理学也形成了一套意识形态结构。矛盾之处在于,意识形态中海洋的变化通常伴随着对元地理学范畴的质疑——或者,试图有意识地阐明全球新图景的人通常构成了信仰新图式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恰恰来源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权力。不过,关于地球划分的古老的地理学观点已经显示出惊人的顽固,甚至是在试图摆脱它的人们中间也是这样。此外,特定的概念是不够用的,我们可以拭目以待。问题仅仅以一种特殊而零碎的方式被提出来。系统化的元地理学已然表现为以维系知识分子的讨论与争论为主题。对旧地理学观念的缺陷的揭示和更新,依然缺乏系统而有力的成果,因此这些观念一如既往地束缚着我们的想像。

如果说元地理学尚未在我们的国家事务中体现出显著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地理学的学科设置上,还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陷。在这个国家,对地理学的忽视是如此普遍,以致那些彻底的地理学文盲遮蔽了我们全球地理学概念的破碎。^[13] 战后,根据多数人的主导意见,美国教育把地理学仅仅作辅修科目。从那以后,多数人对世界所知甚少,而在试图理解其基本结构时又极易犯错,这也就不足为奇了。美国报纸用令人瞩目的大字标题公开批评了我们的学生们对最基本的世界地图的无知,这并不是夸张。即便在声望甚高的大学,也会发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四年级学生面对世界地理略图,将会无意地把亚洲定位在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上。^[14]

学生们不应当承受所有的指责。大多数美国大学生从来就没有正式地学习过地理学。因为20世纪60年代,在一种认为记忆性的学科会使年轻人的头脑变得愚笨的理论影响下,多数小学和中学就已经停止了地理学的讲授。这种误导性的实验造成的遗憾的结果现在已经充分地显现出来,广泛的改革也已经努力付诸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要感谢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al Society)和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他们促成

了基础性的地理教学逐渐回归到美国中小学教育之中。^[15] 父母们看来对此也有所回应,制图玩具和游戏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逐步增长中的辅助产业。然而,在大学这一层次,情况依然严峻。在多数美国排名最高的大学中,地理学是一个边缘学科,不但缺席并且受到其他学科的威胁。因此,我们需要在作为一门学科的地理学缺乏制度支持时,重新审视我们对于世界地理的基本看法,以对这种情形做出有效的回应。

当我们谈到世界区域学或全球地理学这一直接涉及我们如何理解地球的分支学科时,问题就尤其严重了。不仅教育水准极低,而且世界地理根本就不被视为一门具有智力含量的学术性科目。虽然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拥有一大串的专家名录,也不足以否认这一现状。毕竟,专家名录只代表地理学研究的活跃的前沿领域。虽然诸如“老龄化地理学”“圣经地理学”以及“娱乐、旅游和体育地理学”这些分支学科都已经被制度化地纳入正式的研究领域中去,但是,全球地理学仍然遭受冷落。在美国大学的顶尖地理学系,“世界区域”之类的课程被认为只适合作为补习课程给初学者开设。在少数学校的课程表上,这些课程根本就不存在。并且,全球地理学被忽视为只是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即使在那些为学生开设了此门课程学校里,其讲授方式往往也是过时的。世界区域地理学的课本,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充斥着这一学科以往的错误:用已被否认的1920年代环境决定论思潮下土壤地基情况来编制1950年代的区域特性目录。所以,多数美国大学毕业生对世界的概念如此模糊,一点也不奇怪。

xiii

这种秩序上的制度性失误并不容易处理。然而,一种可能的途径是,揭示出美国人对世界的主导观念的偏差:追溯传统元地理学是如何形成并发展出这种主导观念,并分析这些观念是如何继续把我们引入歧途的。本书做的正是这样的尝试。我们的起点立足于这样一个前提之上:无论是门外汉还是学者们,都同样未经批判地接受了一整套便利然而无效的地理神话,这一神话植根于对全球空间图式毫无依据的简化

上。我们特别清理出四种彼此关联的错误观念,它们植根于英语世界中混乱的元地理学:大陆的神话、民族—国家的神话、东方与西方的神话以及地理一致性的神话(比如,认为那些全然迥异的现象显示出空间上的同一变化)。我们会进一步指出,这些观念的存在不仅是出于天真的“误解”,还常常是某种意识形态权力的工具。外交家们、政治家们、军事战略家们使用元地理学结构并不比学者们和记者们少。这些政治家们在为公共想像提供一幅全球结构图景方面,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关注该领域的学者。正如我们应当看到的,世界上某些最基本的,或是想当然的世界“区域”都是由军事思想家们首先确定的。

xiv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花费主要的精力,去检验当前美国使用的主流元地理学观念的智识基础。我们的目的是要研究全球地理学概念是如何运作的,不仅包括它们是如何影响了关于世界的话语系统,还包括它们是如何引导着现实政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细致考察大量的地理学概念,追溯它们的知识学历史,同时考量它们在学术和大众话语中的当代用法。然而,我们首先要承认,这种追根溯源的努力探索还是不彻底的。因为,首先我们的研究范围主要限制在处于支配地位的地理学思想的欧—美模式,我们关注的要点也依然局限于以欧亚大陆为代表的传统。此外,我们的探索仅仅涉及了几个层面,但有关元地理学观念是如何在国际权力政治领域发生作用,这一方面还值得做出更为充分的讨论。最后,对于其他不同的元地理学框架的发展,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不过,我们的结论可以勾勒出一套指导方针,以此来重构宏观区域框架,也可以为将来的研究确定出一系列具有研究前景的领域。要创立一种真正具有批判性的元地理学还需要广泛的集体努力。因此,从很多方面来说,目前的研究还是不彻底的。它的目的主要是让那些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引起关注,而不是提供某种确定的答案。如果本书能够成功地引发争论,并激发进一步的探索,那么它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写作这本书的岁月里,我们拥有着三所大学不同的知识经验。如果